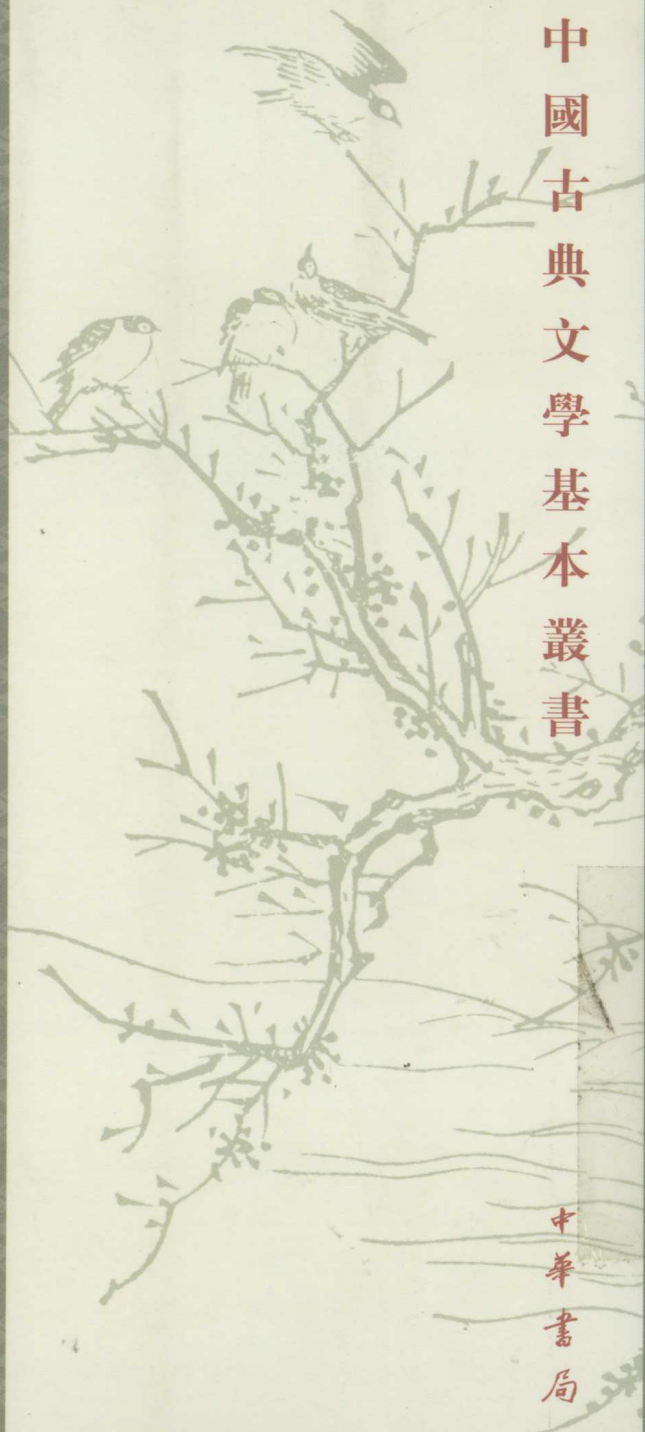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元好問詩編年校注

第一冊

中華書局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元好問詩編年校注

第二冊

〔金〕元好問 著
狄寶心 校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元好問詩編年校注 / (金)元好問著;狄實心校注. —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1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07579-3

I. 元… II. ①元…②狄… III. 古典詩歌—作品
集—中國—金代 IV. I222.74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78615 號

責任編輯: 張 耕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元好問詩編年校注
(全四冊)

[金]元好問 著

狄實心 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65½印張·8 插頁·1500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 196.00 元

ISBN 978-7-101-07579-3

前言

一、元好問的生平與思想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人。系出鮮卑族拓跋氏，唐代詩人元結是其先祖。曾祖元春於北宋末年遷忻。生父元德明、兄長元好古皆有詩名。嗣父元格曾任山東掖縣、河北冀縣、山西陵川、甘肅隴城等地縣令，在隴城兼任鳳翔府路第九處正將，亦能詩。

遺山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一一九〇），時金章宗偃武修文，尊崇儒學，國泰民安，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有「小舜堯」之譽，時代氛圍和家學淵源使其幼年便受到很好的文化薰陶。遺山五歲時隨嗣父至掖縣。七歲能詩，人稱神童。十一歲至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十四歲將習舉子業，嗣父特意選任儒風濃厚的陵川爲官，讓他師從郝天挺問學。當時金朝取士只以詞賦爲重，學者致力律賦，對詩、策、論俱不留心。郝天挺深知其弊，令遺山肆意經傳，貫穿百家，六年而業成，其一生人品學問奠基於此。

遺山二十一歲時，嗣父病卒於官任，遂自隴城扶柩還鄉。此後五六年間，成吉思汗率蒙古大軍頻

頻南侵，河朔州縣大半殘破，忻州被屠，死者十萬，金都由中都（今北京市）南遷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遺山也於貞祐四年（一一二六）攜家避亂南渡，客居三鄉（今屬河南省宜陽縣）。這時，深厚的文學素養和飽經戰亂的生活遭遇使其詩作大放異彩。二十八歲時，他以詩謁見文壇泰斗禮部尚書趙秉文，被譽為「少陵以來無此作」，於是名震京師，人稱「元才子」。又作《論詩三十首》，以「詩中疏鑿手」自任，對自漢至宋的詩人流派進行評價，褒揚風雅正體，貶斥偽邪詩風，成為詩歌批評史上的重要人物。而就在這一年他參加舉試又名落孫山。反思自十六歲以來屢試屢敗的教訓，深感所學與當時科考陋習不合，特別是南渡後生計已無保障，這兩者迫使他對仕隱有所抉擇，於是在次年移居嵩山，並在葉縣等地買田，轉向隱逸生涯。然遺山用世之心極強，始終沒有放棄舉試的機會，終於在三十二歲時登詞賦進士第。當時輿論大嘩，認為禮部尚書趙秉文是「元氏黨人」，「取人逾新格」，遺山「憤而不就選」，「往來箕、穎間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按其什，人嚼其句，洋溢於里巷，吟諷於道路，巍然坡、谷復出也」。正大元年，遺山再試博學宏辭科，中選，任國史院編修官。按說宿願已償，史館又為群英薈萃之地，可與師友朝夕相處，但他在史館日很不得志，鬱鬱寡歡，終於在次年又辭官歸隱嵩山。此後不久，又曾被徵聘入商帥完顏鼎幕府，到方城、南陽等地，但為時僅幾月即辭歸。

遺山三十八歲時攜家離開隱居十年的嵩山赴任內鄉縣令，這是他一生最為快活的時期。其時金朝國土日縮，軍費日巨，所需皆賴河南一地供給，橫徵暴斂，民不堪負，四處離散，田地荒蕪。詩人長期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努力推行仁政，力求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採取約束下吏、抑制豪強、招撫流亡、

恢復農耕等措施，當地縣志載其政績有「勞撫流亡，邊境寧謐」語，認為是「循吏也，不當徒以詩人目之」。閑暇之際，他飽覽內鄉山水，飲酒作詩，放浪形骸，不拘小節，人稱「神仙」。只是好景不長，次年冬他便因丁母憂出居縣東南白鹿原。其後曾代任鎮平令，應徵入鄧州帥移刺瑗幕府。四十二歲時出任南陽令，奏請詔免賦稅，恢復農耕，「善政尤著」。

這年七月，遺山調任尚書省掾。此時妻子張氏病卒於南陽，大女遠嫁，二女人道，他帶着日夜哭泣的三女和三歲的幼子來到汴京，然而一場更大的災難即將降臨。一二一九年蒙古主力西征，只留少量部隊在漢地作戰，金朝得以苟延殘喘。此時蒙古西征主力回師，以雷霆萬鈞之勢掃滅西夏，攻克陝西重鎮鳳翔。鑒於金軍退守潼關，蒙軍又分兵借道南宋，順漢水東下，從南北兩面進軍河南。一二二二年正月蒙軍在鈞州消滅金軍主力，三月圍攻汴京，激戰十六晝夜不克，遂轉攻其他州縣。年底，汴京食盡，金哀宗出奔。其間遺山在圍城中備受驚懼、飢餓之苦。次年正月，汴京西面元帥崔立發動兵變，以城降蒙古。遺山被迫受任左司員外郎，曾為避免同仁流血，主動參與瞭為崔立撰功德碑事，又在蒙古大軍入城之際，上書主持其事的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請求保全安置優秀文人。這年五月，他作為亡金官員被押往山東聊城。

囚居聊城兩年，是遺山一生最為淒惶的時期，一家人住在破廟中，孤獨寂寞，飢寒交迫，由朝官淪為囚徒的失落感與金哀宗自殺、金朝徹底滅亡的淒涼感使他悲傷欲絕。此時他開始編撰《中州集》，以詩存史，並撰《南冠錄》與《壬辰雜編》等史書。四十六歲時，他徙居冠氏，承蒙尊崇文士的冠氏帥趙

天錫的多方惠顧，再加之此地多亡金故舊，其心情逐漸好轉，曾先後游歷濟南、泰山等地。四十八歲時，遺山羈管山東之期將滿，先隻身返鄉安置遷家事宜，闊別二十年，劫後餘生之喜與事往人非之悲使他感慨萬千。次年秋他攜家返鄉，途經濟源休養半年，至五十歲始到家。

遺山歸鄉後原擬是要隱居故里，脫棄世事，作一遺民以瞭殘生的，但後來並未履行自己的誓言。一者是為故國修史，他經常往來於晉冀魯豫，採集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為記錄」，「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再者是為保全知識分子、延續傳統文化奔走呼號，當時他已成爲一代宗工，「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借此機遇，他周旋於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父子及漢人世侯之間，褒獎仁政，宣揚文教，並親自執教培養後學。六十三歲時，他又進見接管漢地事務的忽必烈，奉之爲儒教大宗師，請求蠲免儒者兵賦，使耶律楚材優待知識分子的政策得以延續。此後他爲往來方便移家於河北獲鹿。一二五七年卒，歸葬忻州。

遺山的思想與傳統文人多有不同。他身爲拓跋氏後裔，生活在女真、蒙古政權之下，對漢文化的吸收多有抉擇。他以儒學爲本，向往文治，反對暴政，孔子所提倡的仁人志士的人生價值觀是其一生的行動指南，但有些思想超出傳統儒學之外。

首先，在遺山詩文中極少見「胡」、「虜」等賤視少數民族之語，即使偶爾涉及，如《讀靖康僉言》之「三百年間幾降虜」，也是只從文化層面上對北方少數民族蔑稱，絕不像南宋文人那樣既從文化也從人種血統上罵金人爲「逆胡」、「醜虜」。他晚年編撰金代詩歌總集《中州集》，將其中的女真人、渤海

人、契丹人、南宋人都視爲中州人物，不分中外，不辨華夷，只着眼於中華文化，超越瞭儒家夏夷之大的傳統觀念。進而他以道統定正統，認爲能行孔孟之道即爲中國之君，把積極推行漢法的忽必烈稱爲賢王。其《劉時舉節制雲南》詩把忽必烈的軍隊視爲「漢家」，把忽必烈征大理視爲統一中華的舉動。

其次，遣山繼承瞭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思想，與漢宋儒學所規定的君臣禮義有別。其《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詩之「蛟龍豈是池中物，蟻蝨空悲地上臣」，即是對金哀宗只顧自己逃命而不顧金都吏民的指責。面對故國淪亡、生民涂炭，遣山呼喊的是「秋風不用吹華髮，滄海橫流要此身」，旨在伸志，而文天祥則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旨在守節。遣山冒險勸說汴京留守投降以保全在京百萬人民性命，以民命爲重，社稷爲輕。上書耶律楚材，進見忽必烈，力求保全延續傳統文化，這與南宋滅亡時文天祥等人的行爲南轅北轍。即使是遣山詩詞中對故國的懷戀，也多着眼於昔日的文治昌盛，與文天祥、林景熙、鄭思肖的故君情結有別。

再次，遣山受北方少數民族豪邁粗獷率真性情風尚的習染，爲人豪爽滑稽，不拘小節，與謙謙君子溫文爾雅的儒家風範判然有別。特別是在愛情方面思想很開放。其《摸魚兒》（問蓮根）詞對青年男女相愛却受到家長阻撓雙雙投水而死的遭遇表示同情，這種對有違禮教的男女私情的肯定，在此前的文學史上是沒有的。他對究心於天理人欲的宋儒很反感，其《東平學府記》批評他們「居山林，木食澗飲，以德言之，則雖爲人天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緩步闊視，以儒自名」，「竊無根源之言，爲不近人情之事」。要之，遣山比較務實，在志節這一天平上傾向於求志，使自己的行動服從於時代的需

求，與宋末詩人傾向於求節不同。

遺山於道、釋兩家也兼收並蓄，有所抑揚。他對宋代以來道士裝神弄鬼、畫符作法的荒誕之術不屑一顧，但對道士超脫塵世的高情雅致十分羨慕，特別是對全真教首領丘處機勸導成吉思汗勿濫殺，「億兆之命，懸於好生惡死之一言」的功績稱頌不已。他對佛家本於普救衆生的教義，勸阻蒙古貴族奴役中原人民的功績也予充分肯定，對佛教徒「死生一節，強不可奪，大小一志，牢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不登，無堅而不攻」的堅韌精神也表示由衷的敬佩。

二、遺山的詩歌創作

遺山一生著述甚豐，金亡前側重於文學方面，有《錦機》、《杜詩學》、《東坡詩雅》等，皆佚。金亡後側重於史學方面，有《壬辰雜編》、《金源君臣言行錄》等，雖已亡佚，但元修《金史》多取材於此。今存僅有金代詩歌總集《中州集》及詩選《唐詩鼓吹》。至所自作，文有二百餘篇，「有繩尺，備衆體」，「碑版誌銘諸作，尤爲具有法度」。清人編《金元明八大家文選》，視其爲北方文派之首。其《續夷堅志》有二百餘篇，在文言筆記小說發展史上占重要地位。其詞現存三百八十餘首，詞風「疏快之中，自饒深婉」，「得剛柔兼濟之妙」，爲蘇、辛後一大家。其散曲雖然僅有十幾首，但「由宋詞變元曲始於遺山」，開風氣之先。其成就最高的是詩，現存近一千四百首。

元好問晚年曾對弟子言：「某身死之日，不願有碑誌也。其墓頭樹三尺石，書曰『詩人元遺山之墓』足矣。」這是詩人的自我鑒定，認爲其詩歌成就高於其他。他還曾將自己與蘇軾相比，說「論人雖甚愧，詩亦豈不如」，認爲其詩成就「不比蘇軾差」。元人郝經《遺山先生墓銘》也言其詩「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於正，直配蘇、黃氏」。清人沈德潛等編選《宋金三家詩選》，所收爲蘇軾、陸游、元好問，把黃庭堅也剔去。王士禛《帶經堂詩話》言遺山詩「七言妙處，或追東坡而軼放翁」。趙翼《甌北詩話》進而將上三人細加比較，說：「元遺山才不甚大，書卷也不甚多，較之蘇、陸，自有大小之別。然正惟才不大，書不多，而專以精思銳筆，清鍊而出，故其廉悍沉摯處，較勝於蘇、陸……蘇、陸古體詩，行墨間尚多排偶，一則以肆其辯博，一則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則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構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亦不及也。」翁方綱《石洲詩話》及《七言詩三昧舉隅》也說：「遺山以五言爲雅正，蓋其體氣較放翁淳靜。然其鬱勃之氣，終不可掩，所以急發不及人細，仍是平放處多耳。但較放翁，則已多停蓄矣……遺山七言歌行，真有牢籠百代之意。而却亦自有間筆、對筆，又攙和以平調之筆，又突兀以疊韻之筆，此固有陸務觀所不能到者矣。」蘇、黃之後，放翁、遺山兩家並馳詞場，而遺山更爲高秀。」

從中國詩歌史的角度看，元遺山不僅是有金一代的傑出代表，也是他那一時代南北中國的巨擘。清初汪琬《讀宋人詩五首》即持這種觀點：「後村傲睨四靈間，高與前賢隔一關。若向中原豎旗鼓，堂堂端合讓遺山。」曾國藩《詳注十八家詩鈔》從通史的角度拔選瞭詩歌史上十八位大家、名家（曹植、

阮籍、陶潛、謝靈運、鮑照、謝朓、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韓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隱、蘇軾、黃庭堅、陸游、元好問），以「元遺山爲殿軍。當代詩人、福建社科院研究員蔡厚示在「紀念元好問八百誕辰」研討會上提出元好問是「八百年以來第一人」。今人章必功在《元好問暨金人詩傳·導論》中認爲：

「元好問是金詩第一人。如果在歷史上排隊，可以在屈原、李白、杜甫、陶潛之後，與王維、曹操、李賀、李商隱、蘇軾、陸游等人一道排在隊伍的前列。」在「一九八五年全國第一次元好問討論會」上，山西大學歷史系教授郝樹侯先生又從民族的角度評價，認爲元好問屬鮮卑拓跋氏後裔，又生活在女真、蒙古政權下，稟受瞭北方民族慷慨雄放的氣質，是我國少數民族的最偉大的詩人。臺灣學者呂正惠《中國文學史上的元好問》亦持此論，說「元好問應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具有成就的、也是文化史上最具有意義的「非漢族」作家」。

遺山詩之所以得到如此高的評價，這主要歸功於他的那些感慨亂亡之作。清人從繼承的角度着眼，在元遺山祠堂樹匾，謂之「杜林嫡派」。清人趙翼進而與杜甫比較，謂遺山詩「七言律則更沉摯悲涼，自成聲調，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今人張鼎《遼金詩史》在此基礎上又辟蹊徑，認爲「遺山詩之所以堪入「大家」之列，一則在於其可歌可泣、震撼人心的悲劇審美效應，二則在於他爲詩史提供瞭新的藝術範本……詩人是以在這歷史慘劇中所激發起的強烈主體感受，來攝取當時的客觀情景，熔鑄成有巨大歷史容量的審美意象。這些意象不以指實某些具體史實爲目的，却又有着深刻的時代內容，因而，這些意象顯得頗爲厚重；同時，這些意象又有

鮮明的主體傾向，帶着詩人的激情與個性，易於使人受到強烈的感染與震撼」。日本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關於元好問》也從這一方面立論：「這個世紀最傑出的詩人就是他。同時代南宋「江湖派」的小詩人們根本不是他的對手。他在這個世紀前半葉吟詠的亡國悲哀，雖然也成爲世紀後半葉具有相同命運的南宋詩人們吟詠的內容，但就詩人的力度而言，也不及他。他不僅僅是這個世紀的第一人，也是中國第一流詩人中的一員……他不喜歡把那敏銳的反應立即輕率地表現出來，而是認真地審視這些刺激，審視到對象的各個部分。因此，在他的詩中，無意義的句子是很少的。這種深思熟慮的表達，被認真地反復提煉，就顯得越發渾重淳厚。在渾重淳厚這一點上，他也許堪爲杜甫以後的第一人。」章必功又從興廢鼎革歷史的角度比較：「如果單看歷史上生當興廢之際的詩人，由魏人晉的嵇康、阮籍，由梁、陳人西魏、北周的庾信，由北齊人隋的薛道衡，由隋人唐的虞世南，由唐人蜀的章莊，由南唐人宋的李煜，由宋人元的汪元量、王沂孫，由元人明的高啓，由明人清的錢謙益、吳偉業、屈大均等，那麼由金人元的元好問憑着他的「國難詩」和《論詩三十首》就足以排在第一位。」近人陳中凡《元好問及其喪亂詩》着眼於《續小娘歌十首》之類詩篇，認爲「這類詩是用竹枝詞體唱出的民歌，用接近人民的俚語，抒寫他們深藏在心底的痛楚……成爲當代人民的歌手，放出詩壇異樣的光彩」。

遺山的紀亂詩，按其經歷身份可劃分五個時期。一、避亂流亡期（一二一四—一二一七）：這一時期遺山先避兵於忻州、陽曲之間，後流亡到河南三鄉，詩作或反映蒙古南侵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或感傷金都南遷國勢衰弱，或抒發鄉思離情。這時他身爲學子，年輕氣盛，作品中洋溢着收復河山、重

振國威的豪情。其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帶動瞭金末詩壇由宗宋到宗唐的轉變。二、隱居嵩山期（一一八一—一二二六）：這十年間遺山雖曾出仕，但為期很短，與下層人民朝夕相處，其紀亂詩多從農民的角度着筆，或反映金末的苛政，或揭露吏治的弊端，或展示人禍天災帶來生活的窮困，視野寬廣，用筆辛辣，諷刺絕妙，詩藝更趨成熟。三、三為縣令期（一二二七—一二三一）：當身為地方基層官吏時，其紀亂詩的內容與情調又發生瞭變化。上面催徵賦稅的公文紛繁，督責嚴苛，下面民不堪命，四處逃亡，田地荒蕪，無人佐軍。遺山在這一矛盾中既憂國也憂民，對國難當頭「軍租星火急」表示理解，對民力疲憊不堪表示同情。四、朝官囚徒期（一二三二—一二三八）：這一時期國家由危急到滅亡，個人由朝官成囚徒，滄桑巨變成就瞭詩人的輝煌，其紀亂詩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即指此。實際上這類深感大勢已去，末日將臨的詩作從遺山在南陽聽到鳳翔淪陷的消息後就開始瞭，接着便是汴京保衛戰、金哀宗出奔、兩宮北遷，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畫卷奔赴筆底。當遺山從亡金遺臣的角度反映蒙軍入汴大肆擄掠的暴行時，多用白描手法和淺顯語言直陳所見，不再像寫金末暴政那樣隱晦曲折心慈手軟瞭。編管山東後的紀亂詩或寫淮右戰局、蔡州城破、崔立被誅等時事，或抒今昔興亡之感、巢傾卵覆之悲，佳作迭出。這一階段的紀亂詩側重寫國亡前後的重重大歷史事件和沉痛之感，堪稱「詩史」。其濃縮史實的意象，悲壯激越的情調，出神入化的用典，後人稱之為「遺山體」。五、晚年奔波期（一二三九—一二五七）：歸鄉後近二十年，遺山四處奔波，「其天懷所感激，偶遇一物焉而伸之，其孤憤所鬱結，偶遇一事焉而發之」，其詩藝老手渾成。紀亂

佳作多集中於重至燕都和河南時，大多詩作已不如前一階段沉痛，也有針砭時弊的詩作，如《雁門道書所見》等，但很少。

遺山山水詩的成就也很突出。寫優美之景的名句「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曾被王國維作爲無我之境的例證，然最具個性特色的還是描繪壯美的詩篇。尤其是晚年，詩人放情山水，多宏篇巨製，以文爲詩，隨意揮灑，寫景窮形盡相，議論層出不窮，想象豐富，語言老健，格調蒼涼，其高寒的意境是詩人悲壯情懷與北國高山大川雄偉氣概交響的產物，寄寓瞭一代偉人的胸襟氣度。

遺山的題畫詩有近二百首，既有唐人那類賞畫論畫之作，也注重宋人的「詩補畫外意」，但最具特色的，他把所題之畫作爲引爆其詩情的導火綫，或寫離亂之思，或興盛衰之悲，或評判歷史，或針砭現實，爲題畫詩開拓瞭廣闊的表現空間，開後世趙孟頫、鄭思肖、鄭板橋等將題畫詩與社會現實、個人經歷情感緊密結合之先河。

遺山的論詩詩也久負盛名，其觀點使之成爲詩歌批評家，其體式對後世的論詩詩影響巨大。

遺山詩就體裁言七律的成就最高，其次是七古，再次是七絕。沈德潛《說詩碎語》謂「元裕之七言古詩氣王神行，平蕪一望時，常得峰巒高插、瀟瀾動地之慨……絕句寄託遙深，如《出都門》、《過故宮》等篇，何減讀庾蘭成《哀江南賦》」。趙翼《甌北詩話》謂遺山「七言律則更沉摯悲涼，自成聲調」。此皆深得三昧之言，可供參考。

遺山詩風的形成與其個性、遭遇和深厚的文學素養有關。趙翼謂「蓋生長雲、朔，其天稟本多豪

健英傑之氣，又值金源亡國，以宗社丘墟之感，發爲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爲之，時爲之也」，此誠中的之論，但還需要補充兩點：一者是崇尚雄壯的個性之形成，與其本爲鮮卑族後裔，血管裏流淌着游牧民族奔放的熱血，又成長於女真族政權之下，深受當世粗獷豪邁民風的習染有關。再者是遺山雖以風雅爲正體，但在藝術表現方面兼收並蓄。尤其是對唐宋詩，他宗唐而不棄宋，廣泛繼承宋人以文爲詩、以議論爲詩、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等表現手法，這與南宋及元、明詩人分唐界宋、壁壘森嚴的門戶之見截然不同。劉熙載謂遺山詩「兼杜、韓、蘇、黃之勝，儼有集大成之意」，繆鉞謂遺山「元明之後無與頡頏」，多着眼於此。

關於元好問的現存詩作，明弘治李瀚全集本收詩一千二百八十餘首，清施國祁《元遺山詩集箋注》續採詩集本系統八十餘首，後人又有增補。本書收詩共九零八題一千三百七十首，原則是：

(一)原集中誤收前人詩者刪，如《雜詩四首》出宋汪藻《詠古四首》，《春日寓興》出宋曾鞏《城南二首》。

(二)原集中也有見於後人集中者，如《荊棘中杏花》亦見南宋謝枋得《疊山集》，《蜀昭烈廟》、《新野先主廟》，也見元元明善《清河集·謁先主廟二首》，很難說一定是後人之作，故收之。

(三)對後人輯佚補人之詩，則視具體情況而定。如施本補人《歸潛堂》、姚本補人《西溪二仙廟留題》、《過陽泉馮使君墓》、《方城八景》、《三崗四鎮》、《金鳳井》、《游濟源》、《聖阜危樓》，應是遺山之作，故收之。然從地方志中補人的詩極不可靠，如《神山古剎》、《雁門關外》二詩，則以存疑處理。至於姚

本所收《別冠氏諸人詩》、《送鄭戶曹賦席上果》等篇，原屬蘇軾等人所作，已有人專文辯正，故不收。

三、遺山詩集的版本校注編年

(一) 遺山詩的版本系統

遺山詩的祖本有二：一為蒙古中統三年嚴忠傑所刻張德輝類次的全集本，收詩一千二百八十一首，一為蒙古至元七年所刻曹益甫搜補的詩集本，比前者多八十餘首。二者各自單行。全集系統有明弘治李瀚本（簡稱李全本）、清康熙華希閔本（簡稱華本）、四庫全書本，詩集系統有明弘治李瀚本（簡稱李詩本）、明末毛氏汲古閣本（簡稱毛本）。《四庫全書總目·遺山詩集二十卷》謂「毛晉從全集摘出」，誤。清呂氏南陽講習堂本（簡稱呂本）。清道光二年所刻施國祁《元遺山詩集箋注》（簡稱施本）以華本為底本，以李全本和曹益甫本為主校本，將全集系統和詩集系統的詩合為一體。其後所刻全集如道光陽泉山莊張穆本、光緒讀書山房方戊昌本及一九九〇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姚奠中主編本、二〇〇四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再版修訂本（簡稱姚本）所收詩皆承施本而有所增益。

(二) 前人校勘遺山詩的得失及對策

首次對遺山詩作全面系統校勘的是施國祁。他所用的主校本——至元曹益甫本今已不存，因此他在資料的占有方面優於後人。然施本徑改原文，不出校記，且用校勘正史的方法校勘詩集，求善不

求真。校勘正史旨在爲讀者提供正確的史料，故原本確實有誤，則可依據史實資料徑改，在校記中說明。校勘詩集則不然。讀者除研究詩作外，還要從中瞭解研討作者的學養等。前人往往從遺山詩用典失誤處着眼討論其學養淵源。周壽昌《思益堂日札》舉《洛陽》城頭大匠論蒸土，地底中郎待摸金，謂：「查初白云：『摸金校尉，非中郎也。東坡誤用，先生仍不改。』夫遺山用典，尚承東坡之誤，謂非服習坡詩有素乎？」蔣伯超《通齋詩話》舉《答石子章因送其行》鐵檠豪宕見胡鉦（姚本據兩唐書改「鉦」爲「証」），認爲元氏此誤從唐人小說中來，進而得出「趙耘稔言遺山才不甚大，書卷亦不甚多，信然」的結論。其實元氏此類失誤很多：如《論詩三十首》「無力薔薇臥晚枝」，施據秦觀《春日》詩改「晚」爲「曉」，而元氏《詩文自警》及《中州集·王中立傳》引此句皆作「晚」，足見稿本原如此，《寄辛老子》「可能通客待侯巴」（施本根據《漢書》改「巴」爲「芭」）、《寄答溪南詩老辛願敬之》「飢饉誰能作樓護」（按《西京雜記》「樓」作「婁」）、《麥歎》「辦作高敬通」（按《後漢書·高鳳傳》「敬」應作「文」）亦屬此類。尤其是詩末自注疏誤更多：《內鄉縣齋書事》：「遠祖次山《春陵行》云：『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二句出自元結《賊退示官吏》；《論詩三十首》之九末注：「陸蕪而潘靜」，語見《世說》。「靜」原書作「淨」，同詩之十九自注：「天隨子詩：『無多藥草在南榮……』」（《全唐詩》「草在」作「圃近」），他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自注：「桑梓其剪爲龍沙乎？」郭璞語。《自題寫真二首》自注：「孫綽：『雖沒泉壤，屍且不朽。』」（《希顏挽詩五首》自注：「溘焉溟漠，旌紀寂寥」，《魏書·隱逸傳》中語。）引文皆有誤。由此看來，依前人那種直接替古人改錯的校法不一定符合